

杜威在华经历

张宝贵

杜威小传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59 年 10 月 20 日，他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风景秀丽的小镇柏灵顿，祖辈系英格兰移民。他的父亲阿吉帕尔德·杜威是镇上的小杂货商，人长得不错，脑子也算聪明，能想出许多花样来赚钱，不过由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家里也就攒不下几个钱。好在他人缘不错，日子尚能马马虎虎维持下去。

杜威家族的男丁结婚都比较晚，约翰·杜威出生时，阿吉帕尔德已年近 50 岁，他母亲鲁西娜·里奇·杜威却只有 30 岁左右。鲁西娜的娘家在佛蒙特州算得上是一个名门望族，其祖父做过十年的国会议员，父亲也是当地著名的法官。受家庭的影响，她总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人时，做个善良、勤奋、虔诚、有身份的人，所以她对孩子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希望他们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可她的丈夫就不这样想了，阿吉帕尔德从不对孩子们抱有厚望，只盼他们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做个小商人也就行了。不过在这件事儿上，鲁西娜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除了夭折的大儿子外，二儿子戴维斯后来成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儿子约翰更是了不得，竟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思想家。

在小的时候，约翰·杜威偏于内向，羞涩寡言，一见到女孩子就脸红。鲁西娜对儿子的这种性格颇为担忧，多次开导。在一个暑期，她甚至为孩子们组织了一次野营活动，让他多和小伙伴们接触，这果然使小杜威改进了不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他不但一改自己的腼腆性格，而且竟成了社

会上叱咤风云的一位思想斗士，这当然是他那位善良的母亲所始料未及的。

1867年的秋天，8岁的约翰·杜威进了镇上的“北部文法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学校的教学方法也很机械，没给杜威留下什么好感。但由于家庭的教养和性格的关系，他还能耐下性子跟着教程走。所以在1871年，由于杜威学业超群，跳级后在四年里就读完了小学的课程。次年秋天，13岁的杜威升入了柏灵顿镇的公立中学。当时的中学分两个班，一个是大学预备班，另一个是不升学班。出于个人的兴趣和母亲的主张，杜威选择了前者。还是像以前那样，杜威尽管对大多数老师的讲课没有多大的兴趣，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在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四年的课程。

约翰·杜威中学毕业后，1875年升入了佛蒙特大学。他能有这样的机会，主要是因为佛蒙特大学离家很近，学费低廉，同时还能得到一些奖学金。佛蒙特大学的历史较为古老。它创立于1791年，在时间上仅落后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郎大学等名校。在当时，作为一所专业学院，它的规模是很小的。1879年和杜威同时毕业的学生总共才有18人，全校的学生也不足100人。除了工程学教师外，所有的教员加在一起只有8个人。

在新的环境中，杜威仍延续着以前的沉静，不大与人交往。但时过境迁，他那种多思的性格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位大学生的优点与长处，他在交际上存在的缺陷也为人们所忽视，包括他的同学们。事实上，这种倾向的确显露出杜威作为一位思想家的一般素质，无论是发言还是写文章，他用词都很考究，很慎重，而且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这一点颇得老师们的欣赏，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这就为与同学的良好相处打下了基础。同

时，杜威即便在得意时，也从不趾高气扬、摆架子，加上他待人谦和，又彬彬有礼，所以在同学们中间很得人缘。

在大学的所有课程当中，最先提起杜威兴趣的是生物课。学校使用的赫胥黎的教材专门而系统地介绍了生物进化论的知识，描述了生物与环境间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击破了神学的神圣方舟，这在杜威看来，似乎更接近现实的世界，更符合在自然界、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不过由于达尔文的研究与结论还只是限制在生物的圈子里，还不能满足杜威对生活的理解，他想知道，达尔文的那套东西能否用在人与社会上，于是，他的目光自然就转向了哲学。

教授杜威哲学课程的托里教授对杜威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哲学有着真诚而强烈的兴趣，特别是美学。托里教授讲起课来饱含感情，颇为动人，与杜威中学时听到的照本宣科不可同日而语。更令杜威感兴趣的是，托里教授在课堂上重视社会制度中精神价值的介绍，这不但冲淡了英国经验主义个体分离倾向的影响，而且已隐隐约为杜威心中诸多分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条弥合的线索。后来有一个时期杜威深深迷恋上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说，托里的教学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兴趣空间的扩大与充实，大学的四年对杜威而言充满了愉快的回忆。他毫不费力地学习，但一般总能取得好的成绩。在大学的前三年，杜威基本上沉溺于课外读物上，学业成绩并不像事先期许的那样好。但在第四年，也就是 1879 年毕业时，由于开设的哲学课程投合了杜威的口味，他的学业成绩开始出类拔萃，学校中没有任何学生能够超越他。就在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上，他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荣誉组织（OBK）的一个

会员。

大学毕业后，杜威托亲访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石油城中学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业，月薪仅有维持糊口的 40 美元，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在那里消磨平淡的时光。这样到了第二年，把他调到此校工作的那个表兄为了回家完婚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没有了这个依靠，杜威不得不打起铺盖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柏灵顿。这次他在家待业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夏洛特镇的一所乡村学校找到了一个职位。

杜威的教书任务不重，不必每天到学校去，这样他就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了，而在自己的母校旁边，他也有这样的条件和心情。托里教授一直很看重，也很关心杜威。杜威从宾夕法尼亚回来后，托里欣喜地发现杜威还保留着对哲学的兴趣，于是就花费大量时间指导他有系统地阅读哲学史名著，让他学习和理解那些富于哲理性的德国哲学著作。吃过晚饭，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小镇上空的时候，他常和杜威长时间地在森林间散步，同这位学生探讨哲学问题，谈他自己在教室里从未讲过的观点。托里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教授，但他的气质是怯懦的，他从未有足够的胆量让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杜威后来说，正是因为托里教授对宗教的让步，才使他的天赋未能最后成熟。要不然，他或许会在美国哲学自由的发展中，跻身于领导人中间。尽管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托里毕竟造就了一位未来的思想巨人，正是他，才使杜威明确地选择了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通过托里教授的指导，杜威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但是还有一件事儿令他非常担心：自己有没有能力干这行呢？正是

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态中，1882年上半年，杜威写了一篇题为《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定》的论文，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唯物主义不能够自圆其说。他把这篇稿子寄给了《思辨哲学杂志》的主编哈利斯博士，并且问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能够从事专业的哲学研究？信是在春天寄出的，可是到了10月间，杜威还没收到回音。几乎是在绝望中，杜威又发出了第二篇关于批判斯宾诺莎泛神论的稿子。说来也巧，就在稿件发出的第二天，杜威就收到了哈利斯对他第一篇稿子的回信。回信热情洋溢地肯定了作者的才华，说那篇文章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哲学见解，并且告诉他，杂志的4月号会采用他的稿子。得到这个消息，杜威心中的兴奋是难以言表的，他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托里教授。直到这时，杜威才算下了最后的决心。

得到哈利斯博士的鼓励，杜威找到了自信心，决定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于是，在托里与哈利斯的指点与支持下，他向霍普金斯大学申请了研究生奖学金，准备去读书，但未成功。他只好从一母辈长亲那里借来了500美金，只身来到巴尔的摩，进了霍普金斯大学。

1882年杜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时，该校在美国已有很大的名气，并且还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校长吉尔曼是一位极有眼光、办事很有魄力的人。他在学校广纳贤才，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学校人才济济，群英荟萃，那里的许多教师和学生后来都成了美国学术界顶尖的人物。这所学校之所以享誉国内外，是因为它独特的体制。整个学校的重点都是放在研究生院上，并设立了博士班体制，成为美国第一所可与欧洲大学相比的学校。

吉尔曼校长有着一贯的民主作风，非常关心学生，常把他

们叫到办公室，给予友好的鼓励和建议。在他内心里并不赞成专门的哲学研究，因为在他自己的哲学学习生涯里，他真切地感到美国缺乏搞哲学的基础和环境，很难弄出像样子的东西来。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哲学教学一般都是由牧师兼任的，从学校出去后，找一个职位很不容易，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这个问题上遇到麻烦。杜威进校时，怀着满腔的热忱想从事自己喜爱的哲学研究，吉尔曼尽管清楚这点，但在和杜威个别谈话时，还是建议他转到其他的学术领域中去，给将来就业留个好的出路。可校长的话并未打动这个刚刚崭露头角、对哲学情有独钟的年轻人的心，吉尔曼毕竟不了解杜威个人的心灵经历，望着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他也没什么办法。但吉尔曼并不因为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冷落杜威，而是一直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成长，给他以真诚的关怀。几年后，在杜威获得博士学位时，吉尔曼还把他叫到了校长办公室，对杜威的孤僻和书生气进行了告诫，并给他提供了一笔贷款，使他能够到欧洲进行深造。对这位校长，杜威始终保存着一份感激和崇敬，内心里也确实接受了他的告诫。

在霍普金斯大学，实用主义的宗师查里斯·皮尔士为学哲学的学生开了一门论理学课，杜威却嫌他的论理学太重于数理知识及科学方法方面，专门性太强，缺乏整体社会方面的论述，所以在第一年未选他的课。但由于这是一门必修课，第二年他才勉为其难地选了它，不过也没留下什么印象。20年后，随着自己研究的不断深入，杜威才醒悟到皮尔士论理学中包容着的巨大创造性，并奉其为实用主义的宗师。

同皮尔士相比，杜威当时对乔治·莫里斯及斯坦利·霍尔的课程却非常喜欢。霍尔是美国新派的心理学家，杜威特别爱

上他的心理实验课。同时，杜威对新黑格尔主义者莫里斯的哲学课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没有走出新黑格尔主义的圈子。这一时期，杜威就游走于实验的态度与对黑格尔的信仰之间，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两种思想中的养料。就个人关系来讲，杜威与莫里斯的交往更亲密一些，而后者对杜威也非常赏识，不但把自己的哲学史课让杜威来上，而且还极力提名，使杜威获得了 1883—1884 年度的奖学金。出于这种友谊，杜威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恩师的招请，博士毕业后就来到了密执安大学哲学系任教，成了莫里斯的助手。

杜威是 1884 年秋天来到密执安大学的，到校后，他开设了许多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课程，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选杜威课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叫艾丽丝，奇普曼的女学生，对杜威的学识与个性非常欣赏，而杜威对她坚毅的气质与洒脱的性格也情有独钟。于是，师生间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发展为真挚的爱情。1886 年 7 月，杜威与大自己一个月的奇普曼喜结伉俪，并在 1887 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弗里德内克·杜威。与奇普曼的结合在杜威的一生中是一个重大事件，后来杜威之所以能够克服自己的孤僻性格，对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以至从古典式的书斋中走出来，与自己的妻子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谓是好事成双，这一年，杜威晋升为副教授。同时这一时期杜威的思想也最大程度地接近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心灵》杂志上，他发表了两篇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一个是《心理学的立场》，一个是《作为哲学方法的心理学》。这两篇文章明显受到了莫里斯教授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英国思想界对英国哲学的不满，而试图到德国哲学那里汲取营养的倾

向，也就是试图用有机的系统学说，来补救极端的英国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靠这两篇文章，杜威开始得到美国哲学界的重视。

1888—1889 年间，杜威离开密执安大学，到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道德哲学。其间突然接到莫里斯教授猝然去世的消息，遂回到密执安大学接任莫里斯的职务。由于莫里斯对杜威家一直照顾备至，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借给杜威去住，所以杜威一家对莫里斯的去世深感悲痛，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生下来后，就取了恩师莫里斯的名字，以示纪念。

1894 年，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雄心勃勃，四处网罗一流的人才到校任教。一时间，芝加哥大学群英荟萃，聚集了全国不少优秀的学者，皆为一时之选。可是，当时惟有哲学系的第一把交椅还空着。杜威以前的同事和好友塔夫茨这时已到了芝大，在哲学系任副教授，他不失时机地向芝大校长极力游说，推荐杜威作芝大的首席教授。哈珀也早知杜威是国际知名的教授，因此稍作考虑后，便向杜威发出了正式邀请。

对此邀请，杜威当然感兴趣。因为芝大的哲学系包括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内，他在那里担当系主任，有很多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邀请。经过一番交涉后，他来到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地区的生活消费较高，杜威原指望年薪能拿到 5000 美元，也就是比在密大时多拿 2000 元，补充一下消费方面的差异，但最后只拿到 4000 元，杜威也没说什么，对事业的兴趣毕竟高过了对报酬的计较。

杜威的到来，芝大上下也非常满意，《芝加哥大学周刊》甚至声称：这是一个给芝加哥大学带来荣誉的事件。编辑向人们这样讲到：已经享有国际声誉的杜威教授尚是一位年轻人，只

有 35 岁，但其最辉煌的成就不属于过去而在将来。人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编辑，因为后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

杜威到芝大之后，招聘了许多在密大时的老同事和研究生，比如米德，安德森·穆尔，以及密大校长的儿子，杜威与米德的学生詹姆士·安吉尔。这显然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在里面杜威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这个集体才充满了朝气和生机。在杜威的主持下，他们很快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成为美国思想界突起的一支新军。杜威这时已安下心来，开始考虑他几年来一直关心的教育问题。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之后，遂于 1896 年决定创立“实验学校”。建校前，他先后作了三次公开演讲，阐述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后来这三次演讲的内容连同学校的经验总结汇集成册，于 1899 年出版，即《学校与社会》一书。在以后的时间里，此书陆续被译成 12 种欧洲和东方的语言，杜威的声望因此书的出版而得以确立。

杜威为筹款而作的讲演在学校与社会上很快引起了反响，并得到了家长们在精神与财力上的支持，这样，在杜威担当系主任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系的积极倡导下，“实验学校”（The Laboratory School）在 1896 年顺利地成立了。后来它一直以“杜威学校”著称，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的实验学校，它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杜威学校既不同于以往各师范学校的实习学校，也不同于美国后来发展的“前进学校”（Progressive School）。正如它的名字那样，这是一所将既定的教育计划付诸实验的学校，就像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一般。学校创立伊始，曾遇到过不少的怀疑与阻碍。有些人听闻学校的名字后甚至大为惊骇，他们心里

琢磨着：难道这所学校要把那些可怜的孩子像动物一般给解剖掉吗！由于杜威的教育主张强调学校与生活的内在连续性，所以这所学校的课程编排、教师的职能方法也与传统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最令人感到惊异的一点是，教室内座椅的排列不像以往那样是固定的，而是随时可以移动，这样就可以方便学生们即兴分组，进行各种实验活动。后来，杜威学校的各种举措得到了社会人士及家长们的理解，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并取得了明显的教育成效。人们对此校寄予了厚望，这一切大大地激励了杜威以及他的同事们。

随着杜威在学术界地位的迅速提高，杜威在 1899 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在以后的数年中，除了同时进行教育理论的探讨外，杜威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并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同他年轻有为的同事们和那些已经取得申请博士学位资格的学生们相互切磋，交流意见。这些努力在 1903 年有了结晶，这一年芝大出版了一系列学校成立十周年的纪念论著，由杜威主编，其中就有一本由杜威和同事、研究生们合写的《逻辑理论研究》。此书出版后，得到了詹姆士、皮尔士以及英国实用主义者 F.C. 席勒的热烈赞赏。詹姆士发现这本书中的思想和他实用主义的基调是一致的，有一些观点还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由此他向外界惊呼，“芝加哥学派”诞生了。这一切使得杜威和芝大哲学系名声大振。

但也就在这段时期，在杜威学校身上所潜伏的危机也逐渐显露出来。1901 年，实验学校校长一职空缺。考虑到自己夫人在教育方面的能力，杜威就提名奇普曼为校长。但是，在这之前杜威并未征得芝大校长哈珀的同意，只是在通过聘任后才去函致歉。不论怎么说，杜威的这种做法是欠妥的，而哈珀嘴

上虽没说什么，心里也一定感到了不快。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以后有关杜威学校的几次重要决定，哈珀也均未与杜威商量，使得杜威对此颇为恼火，二人间的对立也日趋尖锐。

到了 1903 年，原属芝加哥学院的实习学校与杜威学校合并到了一起，这是由杜威建议的。两校合到一起后，由杜威的夫人作校长。此项决议实行时，出于人之常情，教育学院及其实习学校有些老师都反对，后来芝大校长哈珀出面调停，决议才得以通过，风波暂告平息。但之后，校内教师分成派系，常生龃龉，使实验学校的精神大损。哈珀对其的态度亦愈加冷淡。这样学校勉强维持到 1904 年，哈珀决定不再续聘奇普曼为校长。按当初学校合并的协议，杜威夫人的任期原为两年，而哈珀当时之所以答应聘任她，实在是因为考虑到杜威的声望出于不得已，心中也只是以一年为限，但当时未向杜威明讲。这样在一年之后，杜威又提出续聘奇普曼三年，此时哈珀态度明确，断然拒绝。杜威一怒之下提交了辞呈，决定离开芝大。

今天看来，杜威提名自己的夫人担任实验学校的校长本无可厚非，根据举贤不避亲的原则完全说得过去。因为奇普曼的确是称职的，她的连任也有利于学校按当初的精神一直发展下去。但由于杜威与哈珀的芥蒂亦非一日之寒，再加上芝加哥学院并入芝大后留下的后遗症，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冲突已不可避免，杜威的毅然离去也就可以理解了。

杜威的辞职在芝大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其后果恐怕也是出乎哈珀意料的。在杜威离开后，教育学教授扬女士也马上提交了辞呈。在之后的时间里，詹姆士·安吉尔辗转去了耶鲁大学，后来担任了耶鲁大学的校长。华生虽对芝大情有所钟，最后还是接受了密大的盛情邀请。这样，“芝加哥学派”就等于是名存

实亡了，而杜威学校随着杜威的离去也寿终正寝。

由于事出突然，杜威在提交辞呈时，还没有想到后来的去处。但他也不怎么担心，因为凭他现在的地位与声望，想找个好的位置并非难事。果然，哥伦比亚大学很快发来了邀请函，杜威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到哥大后，杜威放弃了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实验工作，而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教育原理的阐发中。在哥大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不但继续在国内外的著名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教育方面的论文，而且出版了几本经典性的教育巨著。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在 1916 年出版的，名字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全书以工具主义贯穿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格局谨严，论述细密，几乎无懈可击。由于完整的体系性和现实性，此书出版后即得教育界的赞叹与欢迎，并奉其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巨著。甚至大部分人也承认这种看法，那就是，杜威在这本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教育思想惟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国卢梭的《爱弥尔》堪与媲美，说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三个阶段。

除此之外，杜威还写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著作与论文，像《试验逻辑论文集》、《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及其他论说集》等，这一切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却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名，甚至隐隐有超越詹姆士之势。他曾先后被威斯康辛大学、佛蒙特大学、密执安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05 年，他又被推举为该年度美国哲学学会会长，1909 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副主席，1915 年又担任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第一任会长。

从以上的这些荣誉就可以推想出，到哥大后杜威尽管潜心学问，但决不是个闭关书斋的学者。他此时似乎已完全克服了

早期的局促、宁静，也不再像以往那般随和，他不但在学术争论中寸土不让，到各地去作公开讲演，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变成了一个活跃、甚至激进的社会活动家。杜威的目光关注着社会上几乎所有的社会进步运动，并时刻准备着投身其中，用自己正逐渐成熟的思想 and 行动给予声援。只要他感到自己能出一把力，并符合自己的原则，他也从不推辞加到他身上的各种职务。

杜威在自己的私人交往中也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与人格。1906年的春天，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到美国访问，令美国的舆论界为之大哗。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政治倾向有问题，不同意让他入境。而在人们得知伴他一起来美的女子并非他的妻子，而是演员安德依娃时，就更如一粒石子投到静湖里，一时间朝野俱惊。一些报刊雀起发文，漫天指责高尔基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道德败坏的自由恋爱者，如此等等，把高尔基弄得灰头土脸。波士顿当局不允许他再进该市，甚至美国总统也出面表态，说白宫不欢迎他。在舆论的影响下，连高尔基下榻的饭店也迫于压力赶他们离开。瘟神般的高尔基二人尴尬万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陷入这种境遇。对这一切，杜威夫妇大为反感，于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接二人到自己家来住。这种做法当然为他们夫妇招致了众多的诽谤和围攻，为此杜威还差点把在哥大的教职丢掉，但杜威夫妇的义举却令高尔基二人深受感动。在这个时候，奇普曼又一次表现出了一位不平凡妇女的见识，她坚决支持杜威的做法，开诚布公地讲：我宁愿自己不吃不喝，宁愿看着孩子们受冻挨饿，也不愿看到约翰牺牲他的原则。人们常说，在一位伟大人物的身后肯定会站着一位伟大的母亲，或一位伟大的妻子，至少对杜威来讲，这种说法是合适

的。

1919至1921年间，杜威在中国度过了丰富多彩的两年时光（后面将详细介绍），他也从中感觉到了国际文化交往的重要性。于是从中国回来后，他又先后到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等地做教育考察，特别是1928年的苏联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他虽然觉察到了美国和苏联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显示出来的勃勃生机还是有明显的好感。所以他满怀同情地写了一系列希望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平相处的文章，以至于美国的部分报纸把这位老人描绘成了“布尔什维克”和“赤色分子”，对此的态度杜威仍像以往那样不予理睬。

然而数年后，莫斯科审判托洛斯基案使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接受邀请组织了一个“托洛斯基调查委员会”，并亲任主席，最终宣判托洛斯基无罪。结果出来后，苏联政府一改以往称杜威为“进步人士”的态度，对其大加攻击，斥之为法西斯主义者“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家”等等。在左派文化界中，杜威也被指责为托洛斯基分子或反动分子。

从中国回美后一直到去世，杜威的思想也进入到了成熟期，这主要体现在其代表性的著作上面，包括《人性与行为》（1922），《经验与自然》（1925），《公众及其问题》（1927），《确定性的追寻》（1929），《新旧个人主义》（1930），《艺术即经验》、《一个共同的信仰》（1934），《逻辑探究的理论》（1938）等。特别是《经验与自然》和《艺术即经验》二书，使杜威的声名达到了巅峰，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思想家了，各种荣誉也自然地纷至沓来。1923年，法国学术院道德与政治学会哲学组推

举杜威为通讯院士。1930年秋天，杜威又和爱因斯坦一起，被巴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46年，挪威奥斯洛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又授予他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51年，耶鲁大学也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在杜威的后半生，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依然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9年，已是70岁高龄的杜威挺身而出任“美国人民国会游说团”团长，“独立政治行动同盟”主席，1939年，他又出任“拥护文化自由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并被推举为美国工业民主同盟的主席，美国哲学学会还授予他终生名誉主席的职务，甚至在去世前，他仍在积极呼吁组建第三党。

虽然在最后的10多年当中杜威的思想遭遇到了不少的怀疑与攻击，但他的人格与巨大的威望仍攀升到了顶峰。对这位实用主义元老中硕果仅存的老人，人们从上至下都充满了尊敬，既慑服于他广博深邃的思想，又惊叹于他老而弥坚的旺盛精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声名如日中天的大思想家少之又少，但杜威绝对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1949年是杜威的90大寿，亲朋友生会聚纽约，为老人举办了盛大的祝寿仪式。老人的寿辰也惊动了世界，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瑞典、墨西哥、土耳其、以色列、日本与印度通讯社都为此特发了专稿。英国首相、荷兰首相、挪威首相、意大利总理、奥地利总统等，也都发来贺电或贺信，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与教育家发来的贺信就更如雪片纷至了。在隆重的寿宴开始时人们发现，印度总理尼赫鲁也亲来会场祝贺。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也亲来贺电，颂其为美国人民的顾问、良心和导师。当时的盛况实为罕见，这也给90高龄的杜威老人以莫大的欣